

郑观应藏书思想述评

秦聪立

(华南师大中文系资料室, 广州510631)

郑观应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, 《楼规制》》一文中, 郑观应述道:

本名郑官应, 字正翔, 号陶斋, 别号杞忧生、慕雍山人、罗浮鹤山人等。广东香山县(今中山县)人, 生于1842年7月4日(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), 卒于1922年5月。郑观应长期经营近代工商业, 参加社会实践的时间达65年之久。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、太古轮船公司买办, 并捐得道员衔。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、总办, 上海电报局总办, 轮船招商局帮办、总办、会办, 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; 创办和投资于不少贸易、金融、航运、工矿等企业。郑观应一生著述甚丰, 主要的著作有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、《南游日记》、《西行日记》、《盛世危言后编》、《香山郑慎余堂鹤老人嘱书》、诗歌等。贯穿他一生言行和反映在他著作中的思想核心是“富强救国”。《盛世危言》中的《藏书》篇及《西士〈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〉》集中反映了郑观应的藏书思想。

近代的中华是中华民族灾难最深沉的时期,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,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, 以及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, 旧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在清代, 图书是由政府、书院和私人收藏, 而私人藏书多集中于东南各省。经过19世纪50—60年代的内战, 各种藏书遭到了浩劫。政府收藏四库全书的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化为灰烬, 杭州文澜阁藏书大量散弃, 英法联军又焚毁了圆明园中的文源阁, 翰林院的《永乐大典》也被焚劫殆尽。东南各省民间的学校“旧藏书籍, 荡然无存”, “士子竟无书可读”。战后比较有名的私家藏书仅存聊城海源阁, 常熟铁琴铜剑楼, 宁波天一阁以及后起的归安宋楼、十万卷楼、守先阁, 杭州的八千卷楼, 乌程(今湖州)的嘉业堂等。1885年(清光绪十一年), 中法战争结束, 清政府“不败而败”, 签订了屈辱的《中法越南条约》。当年, 44岁的郑观应“脱累归里, 杜门养病, 日事药炉”。第二年, 开始着手辑著《盛世危言》。在《西士〈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

“尝谓人才之得失, 系国家之盛衰, 是以有国者不可不慎也。然而股肱辅弼, 每资贤才, 究穷物理, 尤需博士。尝见蕞尔小邦崛起振兴, 巍峨大国忽然颓败, 非尽由治理之失法, 亦实缘人才之得也。夫普天之下何处无才? 要在培植之得失耳。而培植之法, 非学问无以立其基。欲增学问, 非诵读无以开其识。然有益要务之书, 卷帙甚富, 价值甚昂, 非寒士所易购, 故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。”

面对列强的侵略, 无论是官府、书院, 还是私家藏书尽付劫尽。一生抱着“富强救国”思想的郑观应疾呼“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”。认为藏书是关系“人才之得失, 国家之盛衰”的基石。同时研考西方各国的博物院、藏书楼为国内藏书之鉴, 他介绍了当时英国、德意志、法兰西、意大利等西方列强的书楼盛况, 尤其对英国伦敦博物院之书楼推崇备至。得出了英国近数十年来之所以人才辈出称雄宇内, 和他们注重藏书, 培植人才得法是分不开的结论。在广西做官时, 郑观应尽将各局津贴、道署公费捐资开设中学堂、小学堂经费, 并出其家藏大板时务书, 选寄百余种为中学堂教育人才之用。认为我国稽古右文, 尊贤礼士, 车书一统。文轨大同, 海内藏书家指不胜屈。然子孙未必能读, 戚友无由借观, 或鼠啮蠹蚀, 厄于水火。是因为藏书“私而不公也”。并建建议清政府“稽查所有新书, 随时添购”, 提出只有认真经理藏书, 基于读书稽古, 数十年后才能“贤哲挺生, 兼文武之资, 备将相之略, 或钩元摘秘, 著古今未有之奇书; 或达化穷神, 造中外所无之利器”, 从而实现他的“富强救国”之梦。

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, 能够提出藏书育才, 富强救国的主张, 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。可是郑观应虽有“烛世变于先机, 挽狂澜于既倒”之志, 但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江河日下, 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蚕食, 他的主张只能“不幸言中而不见行”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 宁波天一阁连续遭到偷窃。1907年, 宋楼、十万卷楼、守先阁的藏书全部为日本人购去, 震惊了中国文化界。为了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, 克服私家藏书资金有限, 借

〔收稿日期〕1999-10-08

阅不便的缺陷,以适应传播新知识的需要,近代的图书馆才纷纷建立。1909年,清朝学部明确将图书馆事业列入预备立宪计划中。同年建立的京师图书馆属国家图书馆,接着各省相继设立图书馆,揭开了近代图书馆事业逐步兴起的序幕。

郑观应的藏书思想除了与他一生“富强救国”的核心思想联系起来之外,还对藏书有其独到的见解。

首先,郑观应认为“私而不公”是历代藏书难以流传的主要原因。同时对“所在官吏奉行不善,宫墙美富,深秘藏度,寒士未由窥见”的做法甚觉痛心。他推崇乾隆时特开四库,建文宗、文汇、文澜三阁造就大批蔚为有用之才的伟业;又对当时循宋楼、守先阁奏请朝廷,开放藏书供一郡人士观赏的做法赞赏有加。言“其大公无我之心。方之古人亦何多让”。他建议清政府应在各厅、州、县分设书院,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,派员专管。更为可贵的是,他提倡官办藏书应向所有读书人开放,“无论寒儒博士”皆“可遍读群书”。这是因为他认识到我国自古以来寒士读书的艰难。“穷秀才”、“穷教书匠”,以及“凿壁偷光”、“聚萤成烛”是穷人寒士读书艰难的最好注脚。

其次,郑观应还意识到中国幅员广大,人民众多,单靠数处藏书,远远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求。尤其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,更应该多建书院,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。然而,郑观应良好的愿望在当时是根本不能实现的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,才迎来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春天。截止1996年底,我国除了少数县还没有图书馆外,全国公共图书馆已达2631所,馆舍总面积达441万平方米,藏书量达到3.36亿册,真正形成了无论寒儒博士可遍读群书的局面。

再次,在藏书经费问题上,郑观应提出可以“或由官办,或出绅捐,或由各省外销科场经费”的主张,并认为只要“将无益无名之用稍为撙节,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”。建议通过众多的渠道来筹集藏书经费。他在考察泰西各国藏书院时,还注意到英国“凡新刊

一书,例以二分送院收贮”的制度。时至今日,由于书价上涨、出版物激增等原因,经费困难已成为阻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,郑观应多途径筹集经费的思想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。

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藏书历史源远流长。东周以前,“学在官府”,“官守其书”,书籍都收藏在王室里面,谈不上社会藏弃。稍后的孔子是历史上文献可考的第一位私人藏书家;常与庄子辩论的惠施,“其书五车”,数量也相当可观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出于政治上的需要,实行“焚书坑儒”,社会藏书第一次遭到大的破坏。汉兴,则广开献书之路,大书篇籍,官私藏书都得到很大的发展。自此之后,朝代更替,藏书兴衰,史籍书之不绝于缕。历代贤哲,都有关于藏书的言论或思想。如隋朝牛弘的“五厄论”,明代胡应麟的“续五厄论”,以及近人祝文白的“再续五厄论”,都论及了藏书与民族兴衰,国家统一的关系。宋尤袤谓书籍“饥读之可以当肉,寒读之可以当裘,孤寂读之以当友朋,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”。清代张金吾认为:“藏书者,诵读之资,学问之本也。”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,在回顾历史、观照当时现实、考察西方各国藏书院的基础上,提出了藏书为育才,育才为强国的思想。较之前人认为藏书可以解饥解忧以及“藏书者,诵读之资,学问之本也”的一己之论不可同日而语。今天,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成为共识,而科技创新则离不开人才,人才的培育则离不开学校和书籍。无论公共图书馆,还是学校图书馆,其中的藏书仍然是今天培养人才的基石,因此,大力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势在必行。

参考文献

- 1 夏东元编. 郑观应集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2
- 2 刘尚恒. 中国藏书文化散论 [J].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, 1998 (2)
- 3 郭豫明. 中国近代史教程 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3年8月版
- 4 李忠惠. 对党校多功能作用的思考. 理论与改革, 1997 (5)

(上接第23页)

3 梁家兴. 论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跟踪教育. 图书情报知识, 1997 (1)

The Appliance of the Resonante Quotient in the Work of University Libraries

YE Li

〔作者简介〕 叶莉,女,1994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,现在广东教育学院图书馆任助理馆员职务。